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

湖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江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frac{1}{32}$ 开·1 $\frac{1}{4}$ 印张·26,000字

1953年7月第1版

195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106·68

目 录

陈伯达同志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

厚今薄古, 边干边学.....	1
关于厚今薄古问题.....	郭沫若 3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范文澜 9
风气和条件.....	范文澜 17
古史领域中“厚今薄古”方针的斗争意义.....	侯外庐 23
需要着重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	刘大年 27

陈伯达同志談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新华社3月10日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今日应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的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他谈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

陈伯达首先对解放后八年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了估价。他说：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还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一批新生力量已经成长；发表了不少好的、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经过思想改造、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以后，有相当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了自己的人生观宇宙观问题，转向或靠近工人阶级。接着他指出，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是“言必称三代”（指夏、商、周）、脱离革命实践的烦琐主义；有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生活，企图躲到“三代”的象牙塔中去，只喜欢讨论几千年前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他认为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现实。而且考古的目的，也应该是为了“温故而知新”。他在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说，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哲学家的哲学文章并没有表现这一点。陈伯达又引用了马克思说的“人

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鑰匙”、“資本主义經濟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的理論，來說明我們研究問題的方法，主要的應該从現代开始到古代，應該克服目前那种偏重研究古代的傾向。

在談到边干边学的时候，陈伯达批判了那些自高自大、翘起尾巴、瞧不起工人階級、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老干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說，渺視劳动人民的人，劳动人民就有权利渺視他。

陈伯达說，学校教育当然能够培养出很多人才，我們必須注意学校教育，但是过去进过大学、出过洋、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真正有學問的，相反的，有些有大学問的人却并没有进过大学、出过洋、得过博士学位。現在在各种崗位上已經出現了一批由劳动者出身、原来沒有受过正規教育、但在工作中經過努力学习已經能够开始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老干部；还有些单位存在一些科学技术問題，是科学技术人員多时沒有解决的，但一經群众討論，就很快地得到了解决。这些新气象說明了劳动人民和老干部边干边学的新跃进。

陈伯达最后說，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應該跃进，而跃进的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所謂厚今薄古，就是說，不要薄今厚古；所謂边干边学，就是說，不一定要学好了才干。这正是毛主席說的“讀書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干就是学习”。

（“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

关于厚今薄古問題

郭沫若

“人民日报”編者按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在5月13日写信給郭沫若同志，請他談談关于历史研究和教学的方針問題。下面是郭沫若同志答复他們的一封信。

关于历史研究或教学的方針問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四个字，言簡意賅，只要我們能把它实行起来就好了。

“厚今薄古”本来并不是伯达同志个人的意見，毛主席早就提出过要我們重視近百年史的研究。今年2月，在一次最高国务會議上，主席提出了一位朋友批評共产党的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过去，迷信将来”，加以指正，說共产党正是这样，正是好社会主义之大，急社会主义之功，正是“輕視过去，迷信将来”。这“輕視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謂“厚今薄古”。不仅历史研究應該以这为方針，任何研究、任何事业都应该以这为方針。

事实上这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一切都当从发展上来看問題。历史是发展，不是倒退。尽管旧时代的发展是不自觉的，統治階級甚至还有意以“厚古薄今”来箝制思想，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仍然今进于古。無論怎么說，鉄器时代进于銅器时代，銅器时代进于石器时代，或者是近代进于封建时代，封建时代进于奴隶制时代。今天是自觉发展的时代了，我們正应该标榜“厚今薄古”来打破迷信，解放思想，形成发展上的大跃

进。

当然“厚今薄古”也并不是說只要今，不要古，或者是把所有古代的遗产都抛弃，并不是那样。这两者是对待着說的，对于今是要得多些，对于古是要得少些。国家不能把重点摆在研究古代或古物方面。古代史和古文物也須得研究，但只能占比較小的比重。例如中国科学院有六十几个研究机构，有六十多个是属于今的，只有几个是属于古的。而且我們的重点所是原子能研究所、經濟研究所等，而决不是古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这就是实际上的“厚今薄古”。象古时候的“学古入官”，“好古敏求”，搞学問就是搞历史的那样的时代，是老早过去了。

搞古代历史的人是要有一些，搞考古工作的人也要有一些。但搞这些工作的同志更要有“厚今薄古”的精神。我們为什么要搞古代史或研究古文物？目的是在闡明历史发展規律，讓人們掌握这个規律，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为現在或将来的建設服务。我們并不是为考古而考古，更不是为崇古而考古。有“厚今薄古”的精神而从事考古，也就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从事古代研究，这样就如居高临下，使研究的对象能听自己的駕馭，历史发展的途徑尽管有怎样的曲折迂回。都无所逃形而历历实現在眼底。假使沒有“厚今薄古”的精神，那就只能是古人的俘虏，古文物的俘虏，一群老古董和書呆子，既无补于实用，也說不上什么学問。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旧学界是沉浸在崇古的空气中的，言必称唐虞三代、尧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請問究竟出了多少了不起的人才？“厚古薄今”的方向是應該老早轉換了。

記得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举行成立大会，在那会上我講过一次話。我說，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在党的领导下已經开辟了一个新紀

元。我举出了六点来証明：（一）从旧时的唯心史观逐步轉向为唯物史观，（二）从个人单干逐步轉向为集体研究，（三）从名山事业逐步轉向为“为人民服务”，（四）从貴古賤今逐步轉向为注重近代，（五）从大民族主义逐步轉向到注重少数民族，（六）从欧美中心主义逐步轉向为注重亚洲历史。我当时为了鼓励大家，所說的多少是出于自己的期待。（詳細記錄見1951年9月29日“进步日报”〔当时“大公报”的改名〕附刊“史学周刊”第38期）。照今天的情况看来，史学界的轉向速度并不那么快。“厚今薄古”的口号提出后，全国学术界都在辯論，这一方面是好現象，但在另一方面也就表明学者們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并未十分深入而一致，我們在思想革命上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当然，崇拜古代也有它的历史根源。不仅我們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我們以前是言必称唐虞三代，外国是言必称希腊羅馬。这里有它根深蒂固的依据。例如古典艺术品是有它的不朽性，为后人所不能摹仿的；古代思想家和文艺家的作品也有它的不朽性和独创性，这就是“厚古薄今”的思想根源。对这种情况，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已經解釋过，他是就希腊艺术与莎士比亚的詩剧来說的。特别是对于希腊艺术的不朽性和不可企及处，他說得很透辟。他說那是和古代未发展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古典社会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古典艺术作品便成为不朽的典型和不可企及的范本。“一个大人不能再成为一个小孩子，要不他就是呆子”。但他須得从更高的阶段上来發揮孩童的天真的本質，也就是創造性和积极性。这是說得再醒豁也沒有的。

就中国古代艺术來說，殷周的青銅器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的，不仅今天搞假古董的人摹仿不到，两千多年来没有一个時

代的銅器能够和殷周相比。其原因正如馬克思所說：产生那种艺术品的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古器物之所以古奥也还有年代的經歷包含在里面。尽管你在形式上摹仿到，甚至把古物作为模子从新翻沙，也翻不出那种的古香古色。那就是因为沒有經過那几千年的岁月，沒有受到原艺术作品在外部和内部所起的变化。所以古艺术品的确是不朽的和不可企及的。但是，能不能根据这一点，便可以認為古代的一切东西都比后来的好呢？当然不能！那样就真正成为“呆子”的思想了。那种想法是“以偏概全”，“厚古薄今”的人正是使用的这种方法，正是希望大人再成为孩子的一大群“呆子”！

中国古代的思想，特别是百家爭鳴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也有它的不朽性和不可企及处。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历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时代，学术思想上有一个飞跃式的解放运动，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更加以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长期停滞，历来的思想和文艺脱不掉百家特别是儒家的窠臼，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就愈見显得是黄金时代。但在今天不同了。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經实现了两个阶段的跃进，思想和文艺，虽不那么显著，也有飞跃式的发展。象毛主席的思想和詩詞就是前无古人的。我們在今天依然还要厚古薄今，那简直是“呆子”中的呆子！

今天我們的知識比古人丰富得多，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孔夫子和孟夫子。例如，今天的三岁小孩子都知道有第三个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古时的圣賢就根本連做梦也沒有想到。当然，我們也并不想“以偏概全”，把古代的好处一概加以抹煞。再說一遍，古代史和古代文物，是須得加以研究，研究它的人不能太多，但也必須专深，才能發揮史学和考古学的作用。要闡明历史发展的正确軌迹，

要強調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勞勇敢和創造熱情，他們尽管在物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依然留下了不可企及的典型作品，这样就使得我們能够准确地掌握規律，提高熱情，勇于創造，勇于改革当今和今后的客觀世界，来提高人民文化生活和物質生活的水平。以批判的精神来研究古代，在今天和今后依然是必要的。要有人担任这项任务，而担任者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厚今薄古”的思想方法，以保證自己和受自己影响者的紅透与专深。紅不透是专不深的。既要紅、又要专，紅要透，专要深，每一种业务都必須如此。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尤其必須如此。研究历史和考古的人是容易陷沒的，搞得不好，每每爬不起来，所以必須更加坚决地抱定“厚今薄古”的精神以防自己陷溺并陷溺別人。象在海水深处游泳的一样，尤其必須精于游泳术。

搞历史是要掌握資料的，但这不是目的。我們不能成为資料的俘虏，要掌握它，据有它，成为資料的主人或支配者。資產階級的史学家只偏重資料，我們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責备，只要他有一技之长，我們可以采用他的长处，但不希望他自滿，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上我們需要超过他。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长的时期內，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話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說。“当仁不讓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們掌握了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們都必須努力超过他！这正是发展的規律。

搞历史的人，尤其搞外国史或世界史的人，精通些外文，我看是必要的。当然，这也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同样不能成为俘虏，而要成为支配者。精通些外文有好处，可以接触外

國資料，更可以和外國學者交流經驗或作思想鬥爭。中國的著作譯成外文的，我覺得太少了。連毛主席的著作，譯成外文的都並不很多。我們在這一方面實在應該補補課。單懂外文不行，還得懂專業，因此搞歷史的人搞些外文，我看倒不是多余的事。不過不應該強調“外文第一”，那是毫無問題的。事實上外文不是第一而是第二或第三，第一是思想、方法、立場——即是說“政治是統帥”。搞專業有了統帥，而再精通些外文，那就有利而無弊了。

學歷史有它的重要性。歷史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具體的教材。通過歷史來教育人民、教育後代，甚至教育人類，是有它的不可輕視的功用。由於膚淺地了解了“厚今薄古”的含義，有些人發生了輕視資料、輕視舊書本的念頭，甚至搞歷史的人也感到苦悶，這也是一種偏向。總之，“厚今薄古”必須同時並提，今古是相對的，厚薄也是相對的，“厚今薄古”同時並提便成為合理的辯證的統一。如果搞歷史的人聽到“厚今薄古”而感到苦悶，那正證明他一向是“厚古薄今”。這樣的觀念必須立即改正過來，抱定“厚今薄古”的方針來搞歷史，那就會心情舒暢，而且會在史學研究上出現大躍進。

（“人民日報”1958年6月11日）

历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

范文瀾

范文瀾同志的這篇文章，原載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報”。本文對我們歷史科學工作者和歷史教學工作者體會“厚今薄古”的方針是很有幫助的。為便於本刊讀者參考，經征得作者同意，特予轉載。作者對本文並作了若干訂正。

——“歷史教學”編者

面臨着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形勢，科學工作也必須大躍進，歷史研究也不例外。歷史科學工作者誰都想躍進，誰都想大大的躍進，干劲是足夠的，問題在於如何躍進。陳伯達同志給我們講話，要我們“厚今薄古，邊干邊學”，如何躍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和如何實行這個指示。當然，對伯達同志的講話有不同意見的，還可以提出來討論，這裡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講歷史，厚今薄古，本來是很自然的道理。現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現實意義。可是，現在史學界的情況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講，越是古的越講，這實在是一種反常的現象，是一種衰暮的現象。伯達同志給我們着重指出來，要我們趕快糾正，是完全必要的。

持厚古薄今論的人也有他們的想法，以為學術是獨立的东西，牽涉到政治就失去獨立性，就不成其為學術。講古，不牽涉政治，所以是學術。講今，總要牽涉到政治，所以不是學術。

这种想法有道理么？我想举出极简单的事例和厚古薄今論者商量商量。

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傳統

因为你們厚古，我不免从古說起：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作“春秋”，从魯隱公元年写到哀公十四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春秋記載二百四十年的事情，按照公羊家的說法，春秋分三世：所見世相当于孔子和他父亲的年代，可以說是当时的現代史。所聞世相当于孔子祖父的年代，所傳聞世相当于孔子曾祖高祖父的年代，可以說是当时的近代史。再往上就不写了。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象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談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賊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誅伐？第二，“史記”。司馬迁作“史記”，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說他薄今么？“史記”的“今上本紀”固然早已失傳，但在“平准書”、“封禪書”中对汉武帝提出批評，这是不是談政治呢？第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这部書虽然比“春秋”、“史記”差一点，沒有写宋朝的历史，但也写到五代。看書名就知道他写書的目的是为朝廷講封建政治学，書中的“臣光曰”，那一条不是談政治的？这三部最著名的史書以外，不論正史或野史，总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正史叙述一个朝代或若干朝代的政治活动，在叙述中就含有写作者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說，“贊”、“評”、“論”、“史臣曰”等等的专为褒貶而作。野史的写成，多在两朝交替特别是在外族侵入統治中国的时候，当然有强烈的政治性。清朝因禁止野史，大兴文字獄。如果历史著作与政治无关，

清朝統治者何苦殺許多人呢。由於文字獄十分殘酷，清朝學者才被迫放棄寫歷史，把精力轉到脫離政治的經學——考據學上去，這完全是在野蠻壓力下發生的變態病態，與顧亭林倡導學以致用的經學——考據學不是一回事了。到了清末中國產生資產階級，它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學術和政治又結合起來。舉例來看，康有為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以變法維新為宗旨。這些講經學、史學的學術著作，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政治著作。江浙學人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創辦的“國粹學報”，以排滿復漢為宗旨。在學報里，講史學主要是宣傳排滿，講經學主要是提倡復漢，這些談經學史學的學術刊物，同時也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政治刊物。由此可見，中國資產階級的早期代表人物並無學術應該和政治脫離的說法。

史書有各種體裁，自然有各種不同的寫法。有些表現出明顯的政治性，有些表現得不那麼明顯或完全與政治無關，不論表現的形式如何，歸根都是當時政治生活的一種反映。但是，明顯地反映出當時政治生活的歷史著作，終究是史學的正常形態，是史學的主流，自“春秋”以至“國粹學報”史篇都應是代表各個時期的歷史著作。此外，不反映當時政治生活的史書，只能作為變態支流而存在。

厚古薄今是資產階級的學風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歷史學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開始表現劃時代的大發展，成為服務於人民革命的一個力量。反動統治階級的學者們，為了對抗革命，提倡學術與政治脫離，企圖使學術脫離革命的政治，變成沒有靈魂的死東西。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是想把反動的政治和學術結合起來的。蔣廷黻等人曾寫中國近代史，把政治與學術結合了，可是對他們說來，結

果坏得很，卖国贼的口供，不打自招了。記得有一个人在他的一本書里替秦檜說好話，鬧得報紙上“輿論嘩然”，這不是想替蔣介石辯護反而明明白白告訴人們說蔣介石就是秦檜么？在這一點上，胡適比那些笨伯們狡猾得太多。他是反動政客兼反動學者，學術和政治在他身上緊緊結合在一起，但在表現形式上却一般是採取政治和學術分開的手法，寫出許多瑣瑣碎碎一字一句所謂點滴功夫的考據文。其中考一些無關緊要的人和事的考據文，就當作研究歷史，認為考據等於歷史，他們既然把歷史說成“垃圾堆”，那麼，撿些片言只字考一考，也就可以自稱為做史學工作了。胡適這樣做，教他的追隨者也這樣做。這樣做的好處何在呢？掉進煩瑣主義泥坑里的人，（一）不關心革命的政治，因而可能傾向於反動的政治；（二）不關心反動的政治，因而有利於蔣介石的橫行無阻。無論是（一）或（二）都對蔣介石有好处，所以，脫離政治的學術正是為反動政治服務的政治性學術，多么巧妙呵！

胡適，經過我們近幾年來大規模的批判，一般地說，我們史學界已經看清楚了。但還有兩種人：一種是自覺的胡適門徒，直到今天還堅持學術獨立的看法，拒絕學術為政治服務，也就是拒絕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六億人民服務；也就是拒絕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運用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去。這種人是極少數，但是必須對他開戰。還有一種人是不自覺的受影響者。他們在蔣介石統治時期，不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滿意蔣介石的反動政治，覺得胡適那套說法可以安身立命，因此，學習做一些瑣瑣碎碎點點滴滴的考據文章。挑選題目，總要離開現實愈遠愈好，寂寞的三代於是變成了熱鬧的市場。因為厚古薄今的習慣已經養成，要改到厚今薄古的方面來，不免感到困難。但是，他們是願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已經取得或

多或少的成績。这种人為數較多，經過自我改造的努力，把旧影响拋掉，是我們史學界的重要力量。

自覺的胡適門徒和不自覺的受影响者兩種人情況不同，但他們厚古薄今，逃避現實、脫離政治的學風是一樣的。這確實是“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風氣，不是無產階級的風氣，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風氣”。陳伯達同志對這種“言必稱三代的煩瑣主義的學風”，予以嚴正的指責，我們應該深刻反省，從“象牙之塔”跳出來。

上面所說的話，總起來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大建設的今天，還保持學術脫離政治的想法是錯誤的。學術一定要為政治服務。不掃清從這個錯誤想法產生出來的厚古薄今的學風，歷史學根本談不到有什麼躍進的可能。

下面，我談談對伯達同志講話的一些體會。

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是史學界存在着兩條路線的表現，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興無滅資和興資滅無兩條路線的鬥爭。不是無滅資，就是資滅無，想妥協并存是不可能的。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工作者必須認清這一點，擔當起興無滅資的責任。不管我們學到的馬克思主義有多少，現在少不要緊，只要學就會多起來，史學工作者在思想上明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陣綫這一邊，確定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只要這樣，氣勢自壯，力量也就來了。那些自稱為有學術的資產階級學者，如果敢於在人民面前翹尾巴，拒絕改造，我們應該毫不留情的藐視他們，要知道，凡是裝腔作勢的人，一定是庸妄淺薄的人，他所自恃的一點所謂學術，既然裝在小器里，其不多不大，可以想見。我們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在較短的時間內，消除資產階級學術在